

收回广州湾租借地的历史考察

刘利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要] 1899年,法国通过不平等条约租借了广州湾。自其产生之日起,中国人民就对此进行了不屈斗争。广州湾租借地的收回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正式提出收回租借地的请求,但遭到了列强拒绝。随后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再次提出这种要求,法国承诺有条件交还广州湾租借地,但是在会后又拖延不交,收回广州湾租借地交涉成为悬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收回租借地运动再起,中国政府亦提起收回广州湾租借地交涉,但无果而终。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广州湾租借地收回提供了契机。战争结束后,中国正式收回了这个租借地。

[关键词] 广州湾; 不平等条约; 租借地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6-0066-07

1899年11月16日,法国逼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借九十九年。租期之内,由法国治理^[1]。但这是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中国人民随时可以废除,收回租借地。广州湾的收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巴黎和会上中国开始提出收回要求开始,直到二战结束中国才最终收回广州湾,历时二十余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①。

一 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与收回广州湾租借地交涉

中国最早考虑收回的租借地不是广州湾,而是旅大和威海卫,这是在日俄战争时期。这是中国收回租借地的最初尝试,但只是昙花一现。收回租借地运动的出现还是在一战期间及其后。一战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中国收回租借地的呼声逐渐出现,政府亦在考虑收回胶州湾。而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中国提出了收回一切租借地的要求。还在一战结束前,北洋政府就在研究战后中国如何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在和会正式召开前,大总统徐世昌成立了外交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提出对巴黎和会的提案,其中包括收回租借地等问题^[2]。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希望条件说帖》,其中包括请求列强归还租借地^{[3]153-198}。

但是,和会以该问题与会议主旨无关而拒绝列入讨论范围。5月14日,和会主持者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回复中国代表团:“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平和会议权限以内。拟请俟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3]199}中国政府本来没有要在巴黎和会上真正实现废除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的打算,只不过是“希望”而已,因此和会拒绝后亦未再坚持。和会虽然拒绝了中国收回租借地等废约要求,但克里蒙梭的“承诺”仍给了中国一定希望。此后,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再次提出废约要求。

1921年7月10日,美国新任总统哈定倡议在华盛顿召集太平洋会议,得到英、法等国同意。这一倡议给中国燃起了新的希望。驻英公使顾维钧立即于7月16日致电外交部,提出应该认真研究如何提交议案。从其所拟参考提案看,取缔不平等条约特权是重要内容^{[3]333-334}。8月13日,美国正式邀请中国参会。不久,中国舆论纷纷关注此事,“其评论已勃然有生气矣。彼等所主张者,为中政府应提出解除其施行独立国家主权之种种羁绊问题及要求修改一切束缚其自由之条约。”一些官员如交通总长叶恭綽亦表示,“太平洋会议予吾人以用和平手段平反此不平等条约之机会,中国人民竭诚欢迎此会者,盖以此也。”^[4]可见,当时中国希望利用此次会议进行废约。

[收稿日期] 2012-10-22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一般)“中国收回租借地运动研究”资助[批准号:湘教财指(2011)91号]

[作者简介] 刘利民(1976-),男,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在太平洋远东问题全体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施肇基提出十项原则,“作解决中国各问题之基础,以期取消中国以往一切束缚”。在第四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又提出具体要求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租借地^{[5]24,55,70}。12月3日,在第十二次会议上,顾维钧提出收回租借地请求,依据的理由是:(1)租借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主要是情势已经发生变迁。(2)租借地主权仍属于中国,不同于割让。(3)租借地的存在对中国危害很大。它们大大有害于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妨碍了中国的国防,使中国不止一次地卷入列强纠纷之中。(4)租借地对各国利益和机会均等造成损害,同时危及远东和平。因此,希望列强交还租借地,同时希望在未废止之前,这些地区应该非武装化^{[6]299-300}。

对于中国的请求,英、法、日反应不一。“有全然表示准备交还的,即日本之于胶州湾,英国之于威海卫是。有相对的表示可以交还的,即法国之于广州湾是。有绝对表示不交还的,即日本之于旅顺、大连,英国之于九龙是。”^{[7]69}关于广州湾,法国代表维维亚尼(Viviani)首先声明:“法国代表团聆取了中国主张的详细说明,愿意本最友好的精神来研究这些主张。如顾先生适才所言,法国只是在其他国家取得了这类让与权后,始要求租借广州湾,以便远东各国的均势不致有对法国不利的变动。”法国代表以此为由,提出法国虽然愿意交还广州湾租借地,但必须以其他国家交还租借地为条件。维维亚尼在陈述法国租借广州湾后所做“成绩”之后,表示法国响应美国号召,愿意做“一樁诚意的和慷慨的事情”。维维亚尼表示,法国欢迎中国的主张,可以考虑交还广州湾,但必须加上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1)以其他列强放弃在华租借地为先决条件,“法国不能成为放弃租借给它的地方的唯一国家”;(2)确保法人在广州湾租借地收回之后的权益,“一切私人权利应获得尊重”;(3)中国必须保证不将如此归还给它的地方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其他国家^{[6]300-301}。由于以其他国家交还在华租借地为先决条件,法国的此项声明“含糊不清,并无诚意。”^{[5]178}

在全体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法国代表沙罗应中国代表的要求再次声明,“他仅是重复维维亚尼在12月4日会议上所说的话,即如其他国家放弃它们各自的租借地,法国准备也放弃它的租借地;而且,即令所有其他国家都放弃租借地这件事办不到的话,法国也愿意和中国政府直接协商实行交还广州湾的条件和时间。”但是,法国并未履行承诺,“就作者所知,自华盛顿会议后,法国并未采取任何步

骤,准备放弃广州湾的租借权。”由于法国声明以他国放弃租借地为条件交还广州湾,而英、日都坚持特定租借地不能放弃,法国也乐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美国又未能为中国主持正义,委员会主席许士“觉得委员会对这问题不能再有所作为,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政策的问题。”^{[6]304,305}租借地交还问题也只能到此为止。

华盛顿会议未能达到中国政府所期望的目标,中国代表只好声明保留以后解决的权利。当然,此次会议并非毫无意义,“然自英人宣言,应允交还威海卫,及法人宣言,应允交还广州湾以来,虽因吾国政局关系,交涉一时停顿,而风声所树,原则上租借地之必须交还,已公认为不可避免之事实。”^[8]换言之,此次会议为此后解决租借地问题打开了缺口,也给中国人收回广州湾等租借地带来希望。1921年12月23日《盛京时报》对此评论:“日前英法两代表在远东委员会,宣言当交还威海卫与广州湾。此事究何时始能实行,为留心大局者所注意。据外交方面消息,胶澳问题现在华盛顿商议交还,大体均已决定。威海卫与广州湾两地,英法既宣言于先,于日本交还胶澳以后,当然有与我国交涉交还之趋势。即英法自身,亦当然有相当之考虑。但华盛顿会议之闭会期间,业已日益迫近,有无提议此事之时间,尚难逃预测,或在华会闭会以后,另觅相当时机,由中国与英法两国另行交涉,亦未可知。总之,此两地迟早亦当交还于我国,但其时期,则仍未确定耳。”^[9]

华盛顿会议后,中国根据会议声明与法国进行交涉,希望法国履行承诺,交还广州湾,但此时法已经改变态度。“实则华盛顿会议中,法国代表起初虽有愿意和列强一同交还租借地之表示;嗣后因为看见日本及英国对于他们的租借地各有保留,法代表又取消前议,而对于交还租借地之议只为一种不得要领的表示,大约法国实际已经决定暂时不交还了吧。”^{[7]69}

事实也是如此。1922年3月18日,中国驻法使馆致电外交部,提到法国的态度变化,清楚地表明法国在交还广州湾问题上并不积极:“(二月七日外交部电)撤废租借地案,在华会提议时,法代表首先赞成,嗣因英日两国对于九龙、旅大有所保留,法代表改言当再考量。近以日还青岛,英还威海卫,业经决定。我国代表询问法国能否归还广州湾,法代表答称:仍不改前次宣言态度,然未尝不愿与中国直接商榷等语。即乘此时机向法政府接洽,以期早日收回……当即遵照部电原意正式备文,于二十三日约见法总理面交,并与切实声明,中国政府深盼法政府

无条件早日实行以为倡率表示。渠允即速研究,务以使两国邦交益更亲密为宗旨,云云。本月十七日准法外部照会复称:华盛顿会议时法国代表之倡议,原冀各国一致进行,今日本对于旅顺、英国对于九龙均无交还之意,法国对于本国舆论及在政治与实际之上利益,势须兼顾,容由主管各部详细讨论后,再将交还广州湾条件通知贵使等语。”^[10]后来经中国驻法使馆一再交涉,法国才勉强表示愿意讨论,但同时提出苛刻的交涉条件,“昨据驻法公使陈篆密电报告,则谓法国政府已允交还广州湾,但提出条件十一项,其关系重要者,即法人对于该处一切权利,不允完全放弃云。”^[11]由于双方在交涉条件方面不能达成一致,中国收回广州湾的愿望也就未能实现。

1923年10月9日,众议院常会决议:“咨请政府依华会决议,向法国政府收回广州湾。”外交部因此向法方提出交涉。此时,中法双方正为金佛郎案关系紧张,法方遂以交还广州湾为筹码要求中国承认按照金法郎赔偿庚款。12月20日,“北京政府驻法国公使陈篆电告外交部称,法外交部派员到使馆申明,法国交还广州湾与金法郎案须连同解决。外交部即电飭陈篆对法国无理要求严加驳复,此两案各为一事,绝不相涉。”^[12]此后,双方在广州湾交涉问题上未有进展。

二 南京国民政府修约外交与广州湾租借地收回交涉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明确提出取消外人租借地的主张。此后,伴随着国民大革命的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当时呼声。在这种背景下,要求收回广州湾的呼声时有出现。如1926年春,中共南路特委书记黄学增到南三考察,就提出“一定要收复法租界”^[13]¹²⁴。同年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提出“打倒法、英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反革命派,肃清土匪,收回广州湾与香港”^[14]⁷⁸。1928年夏秋间,广东省大学生掀起要求法国归还广州湾的运动,引起法国方面的不安。“而一些亲法分子却借口说法帝租借期未届满,且法人统治广州湾社会安定,因而反对要求法人归还广州湾”。这使广州湾租借当局更加嚣张,不但不肯归还广州湾,而且还“越过原划定租界,侵入华界内地”,于是引起遂溪中学学生的愤慨,他们潜入西营张贴打倒法帝、打倒汉奸走狗、还我河山等标语。益智中学学生举行提灯游行,高呼“打到法帝国主义”、“还我广州湾”^[15]。

不仅当地出现收回广州湾租借地的运动,实际

上租借地问题已经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当时即有人呼吁收回一切租借地。如周鲠生在1927年《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呼吁:“若不趁此国民运动正猛烈的时候,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声势正浩大的时候,从事于收回租借地的运动,恐怕将来平和收回的机会就很少了。”他建议:“对于已经中止的交涉,应当重开谈判。而对于尚未开始交涉的租借地,也当要求交还。”^[7]⁷⁰

除民众要求收回广州湾外,政府也在考虑再次提起租借地收回交涉请求。还是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就讨论过收回租借地问题。1927年1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蒋介石就提出对外宣言中应该注重租借地,得到通过^[16]。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仍采取了积极方针,力图进行修约交涉。国民政府提出废除改定不平等条约的计划:第一阶段收回关税自主权,第二阶段废除治外法权,第三阶段收回租界,第四阶段收回租借地,第五阶段收回铁路、内河航运和沿海的航行权等^[17]。按照此计划,从1928年开始先后与列强进行关税条约谈判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交涉,同时还收回了部分租界和租借地。“我国现正积极进行各国在华租界及租借地,如天津比租界、山东威海卫,正在商议收回,其余各地租界,亦谋次第收回。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列为议题之一。”^[18]但在1930以前,收回租借地不是重点。只是在1928年底基本实现关税自主后,外交部开始向各关系国提起收回租界和租借地。1929年就与英国进行谈判收回租界和租借地。1930年又着手与法国、日本等国谈判收回租界和租借地。

1929年初,开始谈判收回威海卫租借地。1930年4月,中英签订交收威海卫草约。威海卫的收回引发了人们的联想,那就是其他几个租借地是否也可以通过外交方式和平收回呢?当时有人就提出,“我们对于收回威海卫所引起的第二个感想,便是像威海卫这种租借地,现在我们固还可以于相当条件之下收回来,可是还有其他各租借地,在最近的期间,也能够顺利进行的收回么?这是我们所急切要求的一个问题。”^[19]丁文江提到,“从华盛顿会议到如今九年,我们对于英国的交涉,处处努力,到了十九年,居然把威海卫收回。但是对于法国方面,可以说完全的放弃,例如上海法租界的法庭,还没有能收回,不要说广州湾了。现在我们晓得广州湾不但是广东的唯一好港,而且是西南几省惟一的海口,将来的重要,还在威海卫之上,应该立刻向法国提议,照

威海卫的先例,履行华盛顿会议的宣言。”^[20]丁文江的目的是“引起国民注意,促进收回之成功”。这种主张得到张其昀等人赞同,他表示:“广州湾至今尚在法国手中,其性质与威海卫同,最近期内必须收回。”^[21]

国民政府向法国交涉收回广州湾是在签订《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之后。1930年2月,“沪法廉协定签字后,外部即着手商量收回广州湾及汉口法租界交涉。其致各国开谈收回租界交涉照会业已准备完竣,当局正慎重考量,冀照会发出后,各国可以就范。”^[22]“我国收回各国在华租界及租借地,外部现正积极准备中”。该年夏间,外交部“发表筹办收回租界三委员会,筹办交涉之进行”。1930年底,外交部向日、法两国提出收回汉口租界,正待两国答复,同时关于广州湾租借地,“均正在准备积极交涉”。外交部表示,“惟无论如何,我国在本年内,决将次第进行,收回各国在华租界及租借地。”^[23]11月19日,王正廷与法国新任驻华公使韦礼登交换各种问题意见,向法方提出交还广州湾的要求,但法使以未得政府训令为由拒绝。外交部因此训令中国驻法使馆与法国外交部直接交涉,而法国此时无意交还广州湾,交涉未得结果。对于收回广州湾等在1930年交涉未得结果,时人要求全体国民与政府“一心一德,共同奋斗,务图于最短期内,收回一切租界租借地,并修改其余一切不平等条约,必也还我国家自由平等独立之地位而后可”。同时,希望友邦“勿再徒托空言,而谓对于中国主权将如何尊重”^[24]。1931年,外交部主要工作是谈判收回法权问题,收回租借地并未作为重点,但仍在准备中。“本年以来外交当局以全力应付法权交涉,最近鲜案事起,国人目标,咸集中新的问题,现悉外部对于收回租界事件,内部仍在不断进行,调查租借缘起期限及经过,列具表册,拟定交涉谈判之准备,闻对于英、日、法、意四国,汉口、重庆、广州湾等地,均拟有发还之具体准备,外部将于最近期内,分别照会各国云。”^[25]但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修约交涉陷入停顿。

政府交涉广州湾问题未取得进展,但民众要求收回租借地的呼声仍有出现。1935年,坡头法官员提出“征收人头税法案”,要求成年男性每月服役四天,不愿意者缴纳每天一元代役金,引起人们反对。南三各村纷纷成立自救会,抗粮抗税。运动中,并有人印发歌谣,提出“赶走番鬼回老家”。1936年3月3日,南三和南二等地民众在坡头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赶走番鬼佬!收复法租

界,祖国万岁!”^[13]¹²⁵广州湾人民的反抗运动遭到租借地当局的镇压。5月16日,广州湾惨案后援会代表30余人到国民党西南政委会及两广外交特派员公署请愿,要求向驻广州法领事交涉,提出取消人头税、惩办凶手等五项要求,其中第五项是“根据华府会议之决定,从速收回广州湾。”^[26]

抗日战争前,国民政府并没有把收回广州湾当作特别重要的问题,在法国拒绝交涉后,国民政府也未继续要求。加上时局紧张,国民政府为应付日本侵略无力顾及广州湾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又成为悬案。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广州湾租借地的最终收回^②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此次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但通过抗战,中国亦逐步提升了国际地位,反而给租借地问题解决带来了契机。同时,二战使法国国际地位迅速下降,亦为广州湾问题解决提供了条件。

此次收回广州湾交涉是在1943年以后。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随后成立了由贝当元帅主持的维希政权(或称“维琪”,Vichy regime)。维希政权与日本关系紧密,对汪伪政权态度暧昧,因此国民政府与维希政权关系比较紧张。1943年2月17日,维希政权准许日军进占广州湾。国民政府立即抗议,“声明一八九九年广州湾租借条约失其效力”^[27]⁶⁴⁷。2月23日,在日本压力下,维希政权又与汪精卫政权交涉,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交还在华租界行政管理权。维希政权同时将此宣言告知国民政府。这引起国民政府的不满。第二天,外交部照会维希政权,“宣布废止广州湾租借条约,并郑重声明,我保留采取必要措施,以保领土主权之行动自由”^[28]¹³²²。但是,维希政权并未理睬。5月18日,维希政权与汪伪政权签订所谓归还租界协定。这次行动引起国民政府异常愤怒。5月19日,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称此行为是“违背国际公法之行为”,“所有法国依照中法间不平等条约取得之租界,北平使馆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已因法国政府之非法行为,归于消灭”,中国政府不再受其约束^[27]⁶⁴⁴。6月3日,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就各项特权进行解释,称该声明废除的对象“系以法国在华根据不平等条约所享各项特权为限。”^[27]⁶⁴⁵广州湾租借地自然属于这种特权之一,亦因此次非法行为而“归于消灭”。但维希政权仍没有理睬这种抗议,7月22日再次与汪精卫政权签订《关于交收上海法国专管租界行政权协

定》。国民政府对此反应非常强烈。8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与维希政权绝交,称:“(维琪政府)对于中国政府迭次声明该傀儡组织与任何国家签订任何协定均为无效一节,加以漠视。中国政府对于维琪政府此种行为,不能再予容忍。兹特郑重宣告,自即日起,中国与法国维琪政府之外交关系即行断绝”,并宣布法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华取得之各项特权及租界与租借地“已因法国自身之非法行动归于消灭”^[29]。因此,法国在法理上已不能享有条约特权,广州湾已经不能再由法国管辖。

维希政权投降德国之后,戴高乐将军(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等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法国临时政府)。戴高乐政府一方面对于维希政权与汪伪政权的协定不予认同,“认为系法国非法政府之行为”,另一方面亦对国民政府宣布取消法国在华条约特权表示不能认可。不过,该组织于1943年8月19日决议,一经中国政府承认,“即考虑修改过去法国在中国保有之特权”^{[28]1323}。8月27日,国民政府追随英美发表声明,承认这个组织。但是,外交部同时指出:“此宣言不得认为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政府或法兰西帝国政府,中国政府确信法国人民日后必能自由组织其政府。”^[30]因此,从法理上说,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无权继承广州湾租借权。

二战结束前,中国已与美、英、比、卢、挪、加、瑞(典)、荷签订了新约,法国势必难以继续保留在华条约特权。中法需要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必然要谈判新约问题,而前提就是法国承诺放弃在华条约特权。广州湾租借地显然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条件。法国前驻华大使纳盖(Mr. Paul Emile Naggiar)称:“未来广州湾问题将由中法两国以友好之方式解决。此一问题之解决,将以中法两国坚定而悠久之友谊为根据。”“法国拟采取与英美相同之政策,且拟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盖所有西方国家,均拟放弃其在中国特权。”^[31]这实际上也就道出了法国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友好”而为之的原因^[32]。同时,中国已经成为“四强”之一,在战后国际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战后法国地位的提高亦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对法国重返远东意义重大。戴高乐需要中国的支持,他希望以废除在华条约特权来换取这种支持。正如有人指出,“这是戴高乐的‘丢卒保车’之计,他最终目的在保全远东的最大殖民地印度支那,而越南三圻适成为印度支那的核心,这是当时戴高乐的战略思想。”^{[33]30-31}而此时法国事实上已丧失了对广州湾的控制权。1943年2月21日,日军进驻广州

湾,1945年3月10日又将租借地法人集中管制,全面接管广州湾。随着日军的投降,中国势必以战胜国的姿态接收该地。国民政府早在1942年7月26日就颁布了《外交部拟定租界租借地及其它特殊区域之收回办法》,规定不管是敌国在华租借地,还是同盟国、中立国在华租借地一律立即收回。^{[27]148-149}戴高乐政府知道战后中国不可能允许法国继续占有广州湾^③。

在这种背景下,戴高乐不得不放弃广州湾。他指示驻重庆使馆代办戴立堂 Daridan 根据两国于1945年3月13日达成的《解决两国悬案之换文协定》,与中方谈判交收广州湾问题。6月27日,法方指示驻华大使贝志高,表示可以考虑将归还广州湾作为中法谈判的条款,前提是这样做可以使中法谈判变得容易。7月11日,法方指示贝志高:“尽快向中方表明:法国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将广州湾租借地的行政管理权正式归还中国”,并表示这个敏感问题尽快“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的话,将确保我们未来谈判的成功。”同时,法国外交部已与中国驻法使馆就此达成协议^[34]。8月18日,双方在重庆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该专条声明1899年租借条约作废,法国将该地行政与管理归还中国政府。但专条允许法国公司和人民继续保留不动产,由中国政府换给新的契据,并允许将广州湾租借地行政长官官邸及附属物免费租给法国政府作为法国领事馆馆址(一年后中国政府可收回使用)。同时附件规定,一俟广州湾解放,双方分别派人组成中法混合委员会解决有关交收行政的一切紧急问题,使法员得在最良好之状况下遣回本国^[35]。这样,法国在争取有利的条件下将广州湾归还了中国。

《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签订后不久,国民政府开始接收广州湾。9月21日,中日双方于赤坎举行受降仪式。随后按照专约附款规定,中法互派人员办理交收事宜。12月11日,前广州湾总公使骆化等搭乘英舰“加顿”号返回越南西贡。至此结束了法国在广州湾的殖民统治^{[33]31-32}。随后,中法双方就一些具体的交接事宜进行了商讨,至1947年5月9日,法国将原广州湾行政长官官邸地皮和不动产交还中国。

四 结语

尽管法国一再拖延,不愿意交还租借地,但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广州湾等最终还是“提前”回到了中国手中。从其收回经过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使法国不得不放弃在华租借地。在

收回租借地的过程中,政府外交努力亦颇重要。北洋政府是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开始废约外交,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向列强提出了取消在华租借地的要求。自巴黎和会以后,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就成为—种趋势。华盛顿会议,政府亦作出了一定努力,虽未能达到收回租借地的目的,但为此打开了缺口。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收回了广州湾。此外,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为租借地收回打下了基础。广州湾的收回就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结果。国际形势变化亦为租借地收回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战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列强对此不得不有所考虑,华盛顿会议上法国作出了交还广州湾的承诺。二战使法国国际地位下降,而中国则逐步提升。而大战后期,广州湾已经落入日军手中,法国已经丧失了控制权。因此,二战结束时中国毫不费力地收回了这个租借地。从广州湾的收回可以看出,民众的斗争、政府的努力、外交的斡旋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等都是租借地得以收回的原因。而从租借地的产生和消亡的历史来看,国力强弱是这一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才能改变中外之间不平等的现象。

注释:

① 有关此问题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刘佐泉.我国收回广州湾始末[Z].湛江文史资料:第9辑:广州湾法国租借地史料专辑,1990.胡世芸.关于广州湾的租借与收回[J].中学历史,1984(6).湛江市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法日侵略者统治下的广州湾与我国收回广州湾而进行的斗争[C].抗法斗争一百周年纪念日1898-1998,1998.等,但对于收回交涉的详细过程均未展开深入研究。此外,在一些中法关系史论著中亦有涉及,如黄庆华.略论二战及战后初期中法关系[M]//王建朗,栾景河.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等,但非专门系统研究。拙著列强在华租借地特权制度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对此已有一定论述,但仍有待深入。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挖掘一些新的资料,作进一步系统考察。

② 本部分内容已在拙著《租借地在华租借地特权制度研究》中详细阐述,此处简略,且稍有不同。

③ 具体原因分析参见拙著《列强在华租借地特权制度研究》第363-365页。

[参考文献]

- [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929.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06.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秘笈

录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4] 项衡方.太平洋会议之参考资料:前编甲[M].上海:上海申报馆,1921:19,29-30.
- [5] 李绍盛.华盛顿会议之中国问题[M].台北:水牛出版社,1973.
- [6] [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M].王绍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 [7] 周鲠生.周鲠生文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 [8] 梁龙.租借地内法权收回问题[J].东方杂志,1926,23(10):7.
- [9] 江沛,等.老新闻1921-1930[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6.
-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477.
- [11] 季啸风,沈友益.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第46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16.
- [12] 李新.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85,116.
- [13] 中共吴川市委宣传部,等.吴川抗法斗争诗文集[M].湛江: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 [14] 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黄学增研究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78.
- [15] 陈以大.广州湾益智中学学生运动片段[M]//湛江文史资料:第9辑:广州湾法国租借地史料专辑.湛江:湛江市紫荆印刷厂,1990:234-235.
- [16] 郑自来,徐莉君.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237-238.
- [17] 杨玉文,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Z].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29.
- [18] 各国在华租界租借地调查[J].军事杂志,1929(16):187.
- [19] 育干.收回威海卫问题[J].东方杂志,1930,27(8):3.
- [20] 丁文江,曾世英.川广铁路路线初勘报告(中英文本)[M].北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1931:82.
- [21] 张其昀.钟山本国地理:上册[M].南京:钟山书局,1938:243.
- [22] 外交法权[J].国闻周报,1931,8(26):5.
- [23] 外部积极进行收回租界[J].民间旬刊,1931(29):26-27.
- [24] 方文政.租界与租借地之收回[M]//时事年刊:第1期,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1:199.
- [25] 收回租界外部正进行[J].民间旬刊,1931(33):25.
- [26] 李新.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20-26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931.
- [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2 编:外交[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8] “教育部”. 中华民国建国史:第 4 篇:抗战建国 2 [M]. 台北:国立编译馆,1990.

[29] 我政府发表宣言与维琪政府绝交[N]. 中央日报, 1943-08-01(2).

[30] 我承认法解放委会将承认宣言送递该会驻英代表英美加三国亦同时宣布承认[N]. (重庆)大公报,1943-08-28(第 1 张第 2 版).

[31] 广州湾问题将以友好方法解决[M]//李慕白. 英文报纸读法. 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89-90.

[32] 黄庆华. 略论二战及战后初期中法关系[M]//王建

朗,栾景河. 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959.

[33] 刘佐泉. 我国收回广州湾始末[M]//湛江文史资料:第 9 辑:广州湾法国租借地史料专辑. 1990.

[34] 葛夫平. 抗战期间中法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 [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 年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39.

[3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3 编:外交[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737-739.

On the Withdrawal of Kwangchowan Leased Territory

LIU Li-m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Kwangchowan became French’s leased territory after 1899 because of the unequal treaty.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made a grim struggle against it. The leased territory was withdrawn after undergoing an experience of a meandering course,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China formally put forward the request to recover the concessions in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 but was refused by the Powers. Subsequently, China put forward this request once again in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the French promised to return Kwangchowan leased territory to China with supplementary conditions. However, the promise was not carried out. The withdrawal of Kwangchowan became an unsettled issue. China saw again the rise of the movement recovering the concess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had negotiations with French government, but all to no purpose. The Second World War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withdrawal of Kwangchowan. After this war, China formally took back this leased territory.

Key words: Kwangchowan; unequal treaties; leased territory